



中山大學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工作简报

第三十期

二零一五年七月编印

目 录

中心动态

- 中心举办“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研讨会……1
 -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研讨会再次举行……1
-

学术活动

- “实践哲学讲坛”第 7 期综述 ……………2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24 期综述……………7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25 期综述……………11
-

学术成果

- 徐长福教授在《世界哲学》发表文章……………14
- 中心成员练建玲在《科学社会主义》发表文章……………14
- 徐长福教授在国际权威期刊 *Marx-Engels-Jahrbuch* 发表论文…15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
邮编 510275

本期责任编辑
刘晓雷

◆中心动态◆

中心举办“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研讨会

2015年4月17日，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会议室举办“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学者和学生参加。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黄颂杰教授就其毕生治学经历作了报告，徐长福教授对报告进行了评论；第二阶段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练建玲、谢翹、徐斌斌分别作了有关伯恩斯坦、费尔巴哈和当代中国社会“微民主”的报告，黄颂杰老师对于三篇报告进行了评论。在闭幕式上，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对黄颂杰教授表示感谢，并对中心成员的科研进步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寄予殷切期待。

(刘晓雷)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研讨会再次举行

2015年6月27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讨会再次于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中山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的十余名学者和学生参加。会议分四个议题进行，分别是“实践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实践哲学与语言哲学”、“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交流与对话”座谈会。在一天时间的议程里，与会者们进行了热烈的思想交流，并结合各自的学术进展，从多个方面对议题进行了探讨。经过此次会议，与会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闭幕式上，徐长福教授对与会者的学术进步表示期待。

(刘晓雷)

◆学术活动◆

“实践哲学讲坛”第7期综述

“实践哲学讲坛”第7期于2015年4月16日下午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期讲坛主题是“思辨与实践：解读西方哲学的重要进路”。本期讲坛由黄颂杰教授主讲，徐长福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评论。

黄颂杰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现任《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中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重点为西方哲学史、宗教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其主要著作有《欧洲哲学史讲话》、《西方哲学史》（上下册）、《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等，译作有《弗洛姆著作精选》、《新哲学词典》等。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撰写、是《哲学大辞典》外国哲学卷负责人、定稿人之一。

黄颂杰教授在讲坛中纵览了西方哲学史，认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应当跳出过去单一从唯物论和唯心论这

一对子出发的模式，而应当全方位、多角度、多进路地理解西方哲学。思辨与实践的角度，就是解读西方哲学的一条重要进路，它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

黄颂杰教授分六个部分概述了西方哲学史。第一，从缘起上说，西方哲学肇端于对本原的求索，而这种求索的背后原因乃是出于人类生存实践的需要。在早期希腊哲学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巴门尼德。如果从思辨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西方哲学，巴门尼德堪称鼻祖。

第二，作为西方哲学的原创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的问题域乃是解救希腊城邦的政治危机，二者的哲学乃是思辨与实践的交会。苏格拉底认为希腊城邦的政治危机在于灵魂出了问题，因此，他将道德教育当作自己一生的使命。柏拉图的著作典型地体现了思辨与实践的交会。其《理想国》中的哲学问题缘起于希腊城邦的社会实践问题，解决之道则是思辨（理论）认知。而“理念论”作为柏拉图哲学

的核心，既为思辨哲学奠基，也为实践哲学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的宝贵历史遗产亦处处体现着思维与实践的关系。作为传统西方哲学和思维方式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用“存在论”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第一个将思辨与实践、思辨之学与实践之学加以明确区分。认为思辨（理论）的知识求真，求事物之为事物的是，求本质、求原因，探讨的乃是真假问题；实践的知识求人的行动、行为，涉及人的意志（意图）和选择，探讨的乃是善恶问题。但是，思辨和实践的最后归宿都是神。康德坚持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向，但接受并发展经验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和对实体的怀疑，将哲学从寻求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从寻求知识的基础和根据，进一步引向为寻求文明社会中人（行为）之为人的基础和根据。黑格尔将传统思辨哲学发展到顶峰。他的“精神哲学”包含着

丰富的实践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等）。

第四，马克思和尼采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颠覆。马克思哲学针对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所产生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他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确立根据和基础，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没有阶级之分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哲学追求的目标、探求的思路与传统思辨哲学有根本不同，其哲学乃是实践哲学。尼采批判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二重世界”划分，抨击超感知世界的存在，强调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强调人所立足的大地是唯一真实的世界。他颠覆了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在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中表现出实践哲学的倾向。

第五，20 世纪前后百余年间西方哲学传统与反传统相互激荡。黄颂杰教授在此对柏格森哲学颇为推崇。柏格森哲学处于西方哲学的转折点，其基本思想是意识与物质的绝对区分。柏格森认为意识界与物质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认为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变异，这一点与传统哲学求常的观念截然相反。柏格森认为时间就是绵延，它如同生命的流，生命乃是不断创造

的过程。萨特接受了柏格森关于流变的思想，认为人的意识是自为的存在，它永远处于悬置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要追求成为一个什么东西。人生就是在不断地追求自在与自为的统一，因此存在主义关注的是人在世界上应该怎样行动。与之相反，罗素则希望为继续知识寻找确定性基础，至少为数学知识寻找确定性基础。

第六，西方哲学的后现代惊雷——即后现代的许多激进观点使我们从传统与现代观点的沉思中惊醒过来。后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都产生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后现代哲学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形成了实践哲学的特点。后现代哲学是在对现代哲学、现代性的批判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突出地批判对普遍性、同一性和本质的追求，强调个别性、差异性和反本质性。

通过纵览西方哲学史，黄颂杰教授认为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主流是思辨哲学，同时伴随着实践哲学；黑格尔之后，实践哲学兴起；而随着

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传统思辨哲学之弊端日益明显，传统实践哲学也渐渐与之不相适应。思辨和实践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两个方面，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人类生存状态这两方面智慧的结晶，二者缺一，都将是一种不良的生活状态。在中国，我们重视实践，但实践哲学并不发达。哲学需要变革，需要把哲学和各具体学科相结合，搞各门学科知识的实践哲学。例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等等。通过各门学科的实践哲学研究，或许能够把一般的实践哲学原理明晰出来。

对于此次讲座，马天俊教授认为，黄颂杰教授把西方哲学三千年来的脉络梳理了出来，提醒了我们“两个世界”的设定、柏拉图的灵魂学说、逻各斯学说、思辨与实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关系、宗教改革的意义、柏格森的哲学和思想史转向等需要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提示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应当有全局观念，要在西方哲学的地图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所处的位置。

精彩互动

Q: 您认为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世界”的划分，因此应当将他看作思辨哲学的鼻祖；而第欧根尼·拉尔修则认为毕达哥拉斯最早地自觉以“爱智慧”为本务，因此，应该把毕达哥拉斯看作思辨哲学的鼻祖。思辨哲学的鼻祖究竟应该谁？您如何评价第欧根尼·拉尔修对毕达哥拉斯这个地位的划分？（马天俊教授）

A: 毕达哥拉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但从思辨哲学的角度看，巴门尼德比毕达哥拉斯更为典型。虽然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对柏拉图也有影响，但相对而言，巴门尼德对柏拉图的影响更为多一些。而且毕达哥拉斯的宗教社团的韵味比较浓重一些，这一点，巴门尼德与之不同。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以巴门尼德为思辨哲学的鼻祖。（黄颂杰教授）



Q: “超感性”的思维方式乃是西方思辨哲学的习惯思维，但并不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您认为柏拉图提出的“哲人王”观点和中国的“平天下”观点具有相通性。问题是，西方的这种思辨传统源于希腊，希腊人所理解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他们有一个超级的“神”的存在，这不是宗教的神，而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神，所以“爱智慧”就是“爱神的智慧”。因此，如果说一个人能思辨，那就意味着他不仅仅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更高的生活方式，更接近

于神的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需要有一个超越于人的世界之上的神的世界存在,思辨才有可能。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这个二分的世界——特别是那个更高的神的世界——而仅仅有世俗世界,那么思辨几乎就没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平天下”思想和西方的“哲学王”思想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一旦希腊的这个神的世界消失掉,西方的这种思辨也会变得不可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天俊教授)

A: “哲人王”与“平天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有相同之处。“平天下”之说,乃是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素养的要求,但是,他们也希望把伦理道德层面的东西转化为治国的东西,把伦理与政治相结合。“哲人王”的概念,也是要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结合在一起。就此而言,“哲人王”与“平天下”的概念乃是有相通之处的。当然,具体而言,二者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这里所说的有相通之处,主要是就其比喻的意义而言,而不是从精确的意义上来讲的。(黄颂杰教授)

(刘晓雷)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24期综述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24期于2015年5月21日下午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期研习会的主题是“农村扶贫工作的思考”，由中山大学哲学系赵一波老师主讲，徐长福教授主持，吴重庆教授评论。

赵一波老师于2013年6月——2014年9月期间，在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保安镇种田村任驻村干部、党总支副书记，实际参与了广东省的农村扶贫工作。



讲座中，赵一波老师介绍了“双到”扶贫的来历，并结合自己扶贫的亲身经历对中山大学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反思，还将其扶贫期间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做了一个多方位的探讨。“双到”扶贫的概念是由广东省在中国扶贫计划中创造出来的。2009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扶贫模式。这种扶贫模式主要是针对不同村采用不同策略，针对不同贫困户采用不同扶贫方式，确保被帮扶的贫困户能早日脱贫走向富裕。

2013年，广东省开启新一轮的扶贫工作，赵一波老师被中山大学派驻在连州市保安镇种田村参加扶贫工作。在讲座中，赵一波老师对种田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总结出该村致贫的五个主要原因。即一、基

础设施滞后，尤其是存在灌溉难、饮水难等问题；二、种植结构单一、种养技能缺乏，农户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植水稻、蔬菜；三、缺乏生产资金，家禽、家畜以散养为主且规模小、商品率低，难以形成规模；四、留守村民老弱病残多，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强劳动力。五、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尚有31户（全村共350户）贫困户长期居住在破旧泥砖房。

关于中山大学对种田村的扶贫工作，赵一波老师从贫困户帮扶、文化帮扶、卫生环境帮扶、基础设施帮扶、办公条件帮扶和经济创收帮扶等六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汇报。贫困户帮扶即直接帮助村里的贫困户解决其生活问题；文化帮扶即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给予帮助——中山大学投资百万为种田村兴建了文化活动中心；卫生环境帮扶即为种田村建立了卫生站、垃圾投放点和公共厕所；基础设施帮扶即帮助种田村兴修了公路和水利工程；办公条件帮扶即为当地村委会盖了新的办公楼、添置了新的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经济创收帮扶即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立了种植、养殖和实践三个基地。赵一波老师对中山大学扶贫工作，在直接扶贫和“扶志”、农家书屋和活动中心如何物尽其用、垃圾如何处理、公共设施如何维护、公路造价问题、办公条件如何长期保证以及创立的基地如何生存下去等问题上进行了反思。此外，赵一波老师还就当地的教育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基层干部工作与待遇问题、反腐倡廉问题、殡葬问题等做了多方位的探讨。

吴重庆教授的评论从中国的扶贫大局着眼，与赵一波老师的亲身经历形成了良好的互补。他认为，第一，贫困问题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直

接关系。中国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使得生产要素在哪里集中成为了关键问题。生产要素的集中，进而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广东和江苏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基尼系数是最大的。广东的粤西、粤东、粤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第二，贫困问题要看农村中贫困的是哪些人。以人均3300元为贫困线，一个家庭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出去打工，一个月往家里寄回1000元，这个家庭也应该脱贫了。所以，真正贫困的家庭，首先是没有办法打工的。而原因则可能是身体、智力上的障碍或者遭遇了重大的家庭变故。

在扶贫问题上，吴重庆教授说，八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整体扶贫，现在则更多地采用“双到”扶贫的模式。整体扶贫存在“造血”和“输血”的问题，而所谓“造血”，即帮助受扶贫地区发展经济，使其形成良性循环。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造血”都是项目带动的，而项目不是每家每户都可以参与进来。一轮又一轮地扶过去，最后依然会有一部分人跟不上。扶贫工作，扶了几十年，前面一二十年脱贫的效果比较明显，但是走到今天，已经到了瓶颈。现在，人们需要反思，那些怎么都扶不起来的人，应该怎么办？吴重庆教授举了两种做法，即直接救济和整村搬迁。广东省曾经在英德实施过整村搬迁，将石灰岩地区的村庄搬到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但是，这样又会造成新居民与原住民的冲突

问题。而如果整村搬迁是针对小民族实施，一旦改造其生活方式，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文化不适应，滋生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针对扶贫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吴重庆教授认为，应当反思当前的扶贫方式。贫困问题不单是经济收入的问题，那些原来不认为自己是贫困的人群，一旦被主导话语界定为贫困，就被迫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而如果不情愿作出改变，又会被认为是无志、愚蠢，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意义都将被消解。因此，扶贫问题还是一个自尊的问题，越是弱势群体，对其施以援助时，越需要谨慎进入。吴重庆教授认为，目前的扶贫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政府应当推动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建立自己的合作组织。其次是要变国家扶贫为社会扶贫，从八十年代至今，中国扶贫投入了1000亿，而绩效却并未达到预期，而扶贫工作也需要专业的社会机构进入。就现在的“精准扶贫”而言，应该把惠农政策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改变“扶大不扶小，扶强不扶弱”的现状，加强对直接生产者的扶贫力度。现场师生就组织起来、社会扶贫、理论与实践如何有效结合、如何为受扶贫对象解决切身需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同时，列席会议的中山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于海燕书记，还表态将支持哲学系师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种田村形成长效联系。在热烈的气氛中，讲座圆满结束。

精彩互动

Q: 吴老师认为当前的扶贫工作，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也需要社会扶贫。把农民“组织起来”效果会怎样？社会扶贫效果又会怎样？（徐长福教授）

A: 在农村，当地人吃得开，外地人是吃不开的。外地企业想进入农村，其实很难留住，而农民自己牵头成立农村合作社就可以。我们在扶贫期间也尝试过办农村合作社，但农民并不太感兴趣，往往是我们抓他们来做，而他们自己没有积极性。

社会扶贫挺好的。现在国家对农民的帮扶，主要是给农民粮食直补，但是一亩地大概就几十块钱，微不足道，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引进专业的社会组织来做扶贫这件事，也很有必要。中大的扶贫工作就没有一个专门的扶贫办，而是挂靠在工会，专业性肯定不强。（赵一波老师）



Q: 中大的扶贫投入了500多万，我们有没有算过一笔账，看看他们到底差多少钱就脱贫？如果直接给他们钱，可以保证他们在多少年之内都能够脱贫？和现在的这种做法相比，哪个会更见成效？（徐长福教授）

A: 关于扶贫方式的问题，省里有规定，不能直接把钱给贫困户。扶贫只能“造血”，不能“输血”。我们的扶贫，之所以把大量的钱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因为只要我们帮他们搞定基础设施，其他事情，他们自己可以做好。而且，在扶贫这件事情上，农民更希望全村都可以受益，如果“精准扶贫”，容易产生矛盾。（赵一波老师）

Q: 作为哲学研究人员，我们的专业研究，怎样才能真的是研究实际问题，

是有关社会、有关实践，能够落在实处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徐长福教授）

A：我们有在种田村办实践基地，我觉得我们学生在做论文之前，可以先去农村贫困地区看看。可以组织一下哲学系的同学，和种田村形成长效的联系，直接帮助其子女的教育。（赵一波老师、于海燕书记）

Q：关于扶贫，我们有没有做过前期调研，了解一下农民的实际状况，包括其思想状况，我们知不知道农民最缺的是什么？我们以城市人的观念去衡量农村人，这样做是否可取？比如说，花费一百多万为农民建活动中心，那些羽毛球场，高档卫生间，有没有建设的必要？反而是卫生站、小学，我认为才是最要害的问题，最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周春健副教授）

A：卫生站的问题和小学的问题，都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可以在硬件上进行帮扶，但是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软件问题。中大可以自己出钱帮他们建卫生站，在上一轮的扶贫工作中也帮他们建过小学。但是，一旦中大撤出，卫生站的医生也就走了，而小学教师，即便中大出钱，镇里也不会派老师。因为村里的学生太少，小学办不起来。至于文化中心，我也在反思这一点，他们现在主要是把文化中心当作办喜事和丧事的大本营。而他们另有的一个小祠堂，才是他们的文化中心。（赵一波老师）

（刘晓雷）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25期综述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25期于2015年6月11日下午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期研习会的主题是“对保罗·利科《作为他者的自身》第九研究——‘自身与实践智慧：确信’的解读”，由高吉兰（Guilhem CAUSSE）教授主讲，徐长福教授主持，朱刚教授翻译及评论。

高吉兰教授2013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塞夫尔中心哲学学院，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保罗·利科国际协会会员。高吉兰教授出版有《宽恕行为：与保罗·利科讨论的哲学思考》（博士论文），近几年发表了《真理与宽恕与和解》、*Réflexion philosophique sur une expérience de médiation*、《保罗·利科哲学中的宽恕》、《承认的时间性》等四篇关于保罗·利科研究的文章。

讲座中，高吉兰教授首先介绍了保罗·利科的生平、《作为他者的自身》的成书背景及其内容。随后，高吉兰教授按照保罗·利科的行文逻辑，对其《作为他者的自身》一书中的第九研究——“自身与实践智慧：确信”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保罗·利科在《作为他者的自身》第九研究中发展了其实践智慧的概念，并认为实践智慧是从“朴素的实践智慧”出发，在经历伦理、道德和政治的旅程之后才达到自身的。高吉兰教授解释了对于保罗·利科而言，伦理与道德的区别。伦理与道德分别与亚里士多德、康德两位哲学家相联系，它们分别代表了从目的论来理解行动和从义务论来理

解行动两种观点。

实践智慧乃是保罗·利科《作为他者的自身》第九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对于保罗·利科而言，实践智慧乃是确信。保罗·利科在《作为他者的自身》第九研究中，分插入段：行动的悲剧、制度与冲突、尊重与冲突、自律与冲突四个部分来研究实践智慧，高吉兰教授对此一一作了解读。关于行动的悲剧，保罗·利科认为古希腊悲剧比哲学更好地解决了道德冲突。悲剧智慧使哲学得以明白，对道德冲突的解决，不能寻求一种理论性的答案，而只能诉诸非理论性的答案：实践智慧。



在制度与冲突部分，保罗·利科认为，制度冲突是关于正义的冲突，它会在社会身份领域、福利保障领域、商品与货币领域以及职业领域等由多元的善而产生的多元“正义领域”中产生。具体而言，在国家中，冲突将会（1）在关于首要之善优先性的日常讨论中出现，（2）作为一种有关良好政府之目的的长期辩论而出现，（3）与关于宪政国家合法化危机的问题一起出现。在尊重与冲突部分，保罗·利科认为，伦理回应了人性（普遍主义）与个人（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产生于当个人的他异性与普遍

观念不能相容之时。高吉兰教授说，保罗·利科的观点是，“实践智慧就在于发明一种行为，它将最能满足关心所要求的例外，又最少可能违背法则。”在自律与冲突部分，保罗·利科认为自律一方面是与互惠相关联的，一方面也涉及对偏见的批判性建构。保罗·利科认为，在其最高和最脆弱的节点上，实践智慧是“论证伦理与审慎确信之间的反思平衡”，它把被断言的普遍性转变为被认可的普遍性。实践智慧的条件是共同生存的愿望强于冲突、叛逆、破坏的愿望，是建立在宽容基础上的愿望。最后，高吉兰教授讲道，保罗·利科在完成对实践智慧：确信的论证之后，追问了“谁是有实践智慧的人？”这个问题。答案是有实践智慧的人是能够负责任的和可被支配的，他具有审慎的确信、批判的关心和平等观念。高吉

兰教授认为，保罗·利科在他的论证中有一个没有明确的观点，即宽恕是一个人成为“有实践智慧的人”的条件。

朱刚教授在评论中认为，保罗·利科的思想渊博深奥，具有综合性，很难读懂。保罗·利科的思想具有中道性，他不仅提出了实践智慧的理论，同时也践行着实践智慧的中道性，其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之间。此外，朱刚教授还再次简要地概括了此次讲座的内容，并明确了“有实践智慧的人”这个概念的三个规定性，即可归责性、负责任的和可被识别。在最后环节，现场师生针对保罗·利科的实践智慧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伽达默尔的实践智慧之区别、生活故事、限制暴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热烈的互动中，讲座圆满结束。

精彩互动

Q: 第九研究的标题是“自身与实践智慧：确信”，但是，文中出现的几个实践智慧，只有最后一个是与确信相关的。那么，实践智慧是什么意义上的确信？或者说是对于什么确信？（朱刚教授）

A: 在保罗·利科那里，实践智慧在各个层面上都是与确信相互关联的，但其关联的对象各不相同。在伦理层面涉及到个人，确信关乎善；道德层面涉及到承诺，确信关乎有效性。实践智慧是在冲突中做选择。（高吉兰教授）



Q: 与保罗·利科相同，德里达、福柯也讲正义与平等，但是德里达和福柯认为正义是位于平等之下的，正义和平等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朱刚教授）

A: 平等涉及的是个人的感觉，而正义涉及客体化、结构性，二者有可能会相冲突。（高吉兰教授）

Q: 关于“共同生存，汉娜·阿伦特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阿伦特不太认可暴力的使用，她认为“the will to live together”很重要，而这一“will”应该建立在无暴力的基础上，利科却并不完全禁止暴力的使用。暴力的使用会导致一个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伤害权力的原意：“the will to live together”。利科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概念？（张子骞）

A: 完全禁止暴力的使用，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不同意见。如果要共同生活，就要用暴力制造同意，因此，不可能禁止暴力。另外，暴力并非一无是处。暴力可以建立起权力的机构，管理人们更好地在一起生活（高吉兰教授）

Q: 在欧洲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群体，比如移民等，如何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实现同一？（杨玉昌副教授）

A: 这种同一性需要通过叙事身份来实现。（高吉兰教授）

（刘晓雷）

◆学术成果◆

徐长福教授在《世界哲学》发表文章

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近日在 2015 年第 3 期《哲学世界》“法国哲学”板块上发表了《实践之“我”与理论之“我”——笛卡尔之“我”的语用调查》¹一文。

在该文中，徐长福教授指出，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命题中规定“我”就是“我思”，意指一个纯思维的实体，并以之作为其哲学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对于该命题的含义和是非，哲学史上存在着复杂的争议。徐长福教授采取语用调查的方法，对笛卡尔在其著作中使用“我”这个词语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得出了如下基本看法：在笛卡尔的著作文本中有两个“我”，一个用作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指代笛卡尔本人，在叙事中实际发挥着指代行为主体的作用，为实践之“我”；另一个被动接受笛卡尔的思辨规定，表示实体性的我思，为理论之“我”；徐长福教授认为，前者可以用“笛卡尔”这个普通专名来替换，或跟该专名合并使用，后者则不能这样；前者的使用一向清楚明白，后者的含义则始终令人费解。因此，如果哲学真要找寻一个具有确定性的起点，实践之“我”肯定优于理论之“我”。

（刘晓雷）

中心成员练建玲博士在《科学社会主义》发表文章

中心成员练建玲博士近日在 2015 年第 2 期的《科学社会主义》上发表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通信集〉的出版及其意义》²一文。

在该文中，练建玲博士首先简要回顾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通信集》的出版过程，接着对已出版的三卷通信集从数量上进行统计，并根据通信频率将两人的关系划分为四个时期：合作期、分歧期、冰冻期和恢复期。最后，练建玲博士从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之争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想的形成两个方面说明了通信集出版的意义，并认为，它打破了以往学界对两人思想的传统理解，同时对于推进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思想的研究将产生实质性影响。最后，练建玲博士指出，对通

¹ 该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批准号：13AZX003）和 2013 年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西（方）实践哲学的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

² 该文系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语言转向研究”（批准号：13AZX003）阶段性成果。

信集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将成为今后我国学术界关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思想研究的新热点。

（刘晓雷）

徐长福教授在国际权威期刊*Marx-Engels-Jahrbuch* 发表论文

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在刚刚出版的国际权威期刊 *Marx-Engels-Jahrbuch*（《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14 年这一期上发表论文 “On the Reception of Marx in China Today”（《论当今中国对马克思的接受情况》）。

Marx-Engels-Jahrbuch 是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于 2003 年创办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刊，编辑部设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其前身为创办于 1994 年的 *MEGA-Studi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研究》）。该刊主要发表当今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文，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已为国际学界所公认。

徐长福教授的这篇论文为该刊及其前身迄今为止所采用的第一篇来自中国学者的投稿。该文客观介绍了本世纪以来中国解读和接受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情况，包括党的观点、重大课题研究情况、若干学者的见解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看法，并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论。

该文在该刊发表表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学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已跻身国际前沿。

（黄晓平、练建玲）